

中国聚焦 郭良平

高水平才能和平崛起

当今世界有两大趋势：力量分配的扁平化和暴力手段的平民化。超富超强的美国，20年打不赢衣衫褴褛的乌合之众塔利班；一个超级大国对微小、独狼似的恐怖活动往往也束手无策。硬实力贬值，软实力升值。

对希望和平崛起的中国来说，赢得世界尊重和认同，比原子弹和核潜艇更重要。然而，各种民调显示，目前中国在各主要国家中的声誉是十数年来最低的。

仅仅七八年前，中国还大红大紫。“中国模式”“北京共识”在世界各地为人们所津津乐道，到中国取经和淘金的熙熙攘攘、络绎不绝，汉语热至今尚未消退。何其突兀也？

一个重要原因是：苏共亡党亡国30载后，它的旧名声又来拖累中共了。改革开放40余年后的中国，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但中共没能以崭新的面貌来展示自己，却坚持用旧瓶装新酒，自认与苏联一脉相承，不自觉地将自己代入冷战的推导公式和话语体系中。它的许多“恶名”是从苏联推导出来的，用官方的话，是“对中国的严重误判”。

中国的底气

“严重误判”下的中国当然不是真实的中国。前些年的“中国热”，虽然有些“盛名之下，其实难符”，但也不是空穴来风。中国确实取得了值得自己骄傲，也值得其他国家学习、效仿和羡慕的成就：

社会秩序好、犯罪率低、安全；社会团结稳定，人民安居乐业，几乎看不到在美国常见的无家可归的现象。经济持续增长40余年，几乎没有危机；基础设施、教育、医疗、健康、住房、环境、养老健身、体育等民生事业不断进步。科学技术在许多领域步入世界前列；市场繁荣，消费旺盛，电子支付独步世界，交通出行方便，大妈购买力爆棚。人均寿命、住房面积和自有率都跻身甚至高于某些发达国家；私家车销售全球第一。

老百姓有足够的自由（择校、择业、迁徙、日常言论、创业、婚姻等）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。反腐和法制建设有长足进步，政府支持度高，政策反应比较快，决策、执行力和应急动员能力强，干部有长期经验和能力储备，国家能够在各方面全面长期规划，下决心要办的事情几乎都可以办成，国防建设和国际地位不断加强等等。中国民间那种蒸蒸日上的感觉和对未来的看好，在多数发达国家已经久违了，在发展中国家也很罕见。

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，也是西方专注的缺点或“罪恶”所掩盖不住、抵消不了的。这些成就西方政客可以视若无睹，但对平民百姓却有强大的吸引力，也是中国的底气所在。若应对得当，世界各国学习、效法甚至吹捧中国有可能再次蔚为风气，包括那些优越感十足，却在一系列困难和问题上束手无策的西方国家。

正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困境——社会失范、政治失序、安全失控、精英失职等，使中国有可能名声再次逆转。自由主义话语霸权的衰落，会加速国际关系重组、国际格局重构、国际秩序重建和国际规则重写。对中国的围堵和打压，自然会土崩瓦解。

这就是中共的幸运和机遇，若苏东剧变发生在今天，其结果可能会很不一样。不过，中共有可能在两方面犯错误，而丧失这个机遇：对待自由主义的态度和对苏共遗产的处理。前者处理好就能建立“好人”形象，后者处理好就能摆脱“坏人”名声。

对待自由主义

当“好人”的基础是共同语言和公认标准，和平崛起只能建立在现代文明的一些基本共识之上。自由主义价值观是与现代化共生的，很难区分开来批判，特别是当自己也在搞现代化时。中共1980年代反“资产阶级自由化”运动很快就夭折了，搞得自己很被动。

游离于国际主流话语体系之外就会被视为另类。自由主义的衰落，主因不是它的主调价值观，比如自由、民主、平等、法治、人权等，而是它没能包含的内容，比如仁义礼智信、公正、孝廉、勤勉、自律、和谐、尊老扶幼、天人合一、大同世界、天下为公等。

华夏文化在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中，几乎完全边缘化了。然而，现代化发展到现在，急须补充新元素来突破瓶颈。自由主义的狭隘，使它无法解决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，让中华文化终于有了用

武之地。不过，出发点应该是人类共同的需要，追求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理念，而不仅仅是标榜中国特色。中华文明的复兴不是与自由主义分庭抗礼，而是兼收并蓄，做得更好、更全面。

对待苏共的遗产

中国驻美新大使秦刚一到华盛顿，就到处宣讲中国与苏联有本质的不同，劝美国莫要误判中国。的确，上列成就是在苏联是不可想象的。然而这姗姗来迟、亡羊补牢式的分辨，也揭示了中共总结苏共教训的局限性。中共领导层在达顶前，一直忙于政务和处理各种关系，少有机会在宏观高度上自省和创新，于是不能不深受年轻时的意识形态灌输的影响，甚至将一些旧术语也搬了回来。

比如，毛泽东说不能丢掉“列宁这把刀子”和“斯大林这把刀子”，这种语言用在现在，反映的是一种影响到政治方向的怀旧。西方并没有完全误判，至少在中共彻底梳理清楚前是如此。

在国际主流舆论中，往斯大林身上靠，无异于往“坏人”圈里钻。毛时代成长起来的人很难意识到这一点，但在国外亲斯大林同亲希特勒一样犯忌。这里当然包含了偏见：西方国家可以承认前共产党国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，但其领导人是一群恶棍、杀人犯、独夫民贼。

无论历史事实和是非曲直如何，这就是国际舆情的现实。盲目“回归初心”就会拉大中共与世界的距离，使其再次“独立寒秋”。这显然同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大业是背道而驰的。

在西方，冷战的遗产包括一整套词汇和话语体系，还包括许多其他历史沉淀，如小说、诗歌、回忆录、电影、采访报道、政治文件、法律、防御条约、盟国关系等，还有一大批可从新冷战中渔利的政党、政客、媒体、公司财团等。条件适当时，它们很容易被激活，并演变出相对独立的生命。中共恰恰提供了这些条件。

于是，在这套话语和利益体系中，中共的“恶”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，一切行为都被对号入座来理解，干的好事被往坏处想，不干事也是在图谋不轨。要摆脱这个困境就须拉开与苏共和旧我的距离。

高标准而非大外宣

上述中国的成就，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某些发达国家，但在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里的权重很低。好在百年巨变中，民生问题在发达国家正上升为主要政治议题，这会导致自由主义价值体系的调整，使中国有条件成为一个标杆国家。不过，中国必须通过实干来不断提高自己各方面的水平，而不是通过大外宣来为自己塑造形象。

中共的大外宣是个大失败：数百亿的花销得来的是“锐实力”的嘲讽，各国政府对“渗透”的调查，以及与戈贝尔齐名的苏共宣传机器的旧恶名。大外宣的出发点就错了，将国内搞宣传的那一套用到国外，强化了中共是苏共还魂的印象。

此外，认真清理苏共遗产，才有可能改变一系列强化冷战话语、坐实旧形象的行为和习惯。第一，官话套话废话充斥；众口一词，无休止地重复领导人语录和官方提法；大小官员、学者、记者编辑，甚至普通老百姓都像被输入了程序一样，不厌其烦，不分场合，不顾自己的形象，不顾听者的麻木，千遍万遍地重复，直到有新程序输入。现在学者发表个人见解和研究成果，政府也要干预定调，迫使人人自我审查。这是内政话语体系制约外交辞令所致。

第二，划线站队，非我即敌，非白即黑，压制正常讨论和争议；纵容无原则与无理性的民族主义、民粹主义和话语恐怖主义；制造政治正确的高压和噤若寒蝉的气氛。

第三，个人崇拜抬头，操纵舆论，灌输思想，控制信息，不让人讲话，以及改革开放前在“无产阶级专政”名义下积累的恶习，如鼓励告密和背叛、胁迫下的坦白认罪、非法羁留、高压维稳等。

反过来，客观理性、法治、决策透明度、政治斗争文明化、对人权和人的尊严、社会公平正义、

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等，在这些方面提高水平不是做给人看的，而是在自己进步的同时，也能够改变形象，赢得认可、认同和尊重，不再被视为异类和威胁，从而降低冲突的概率，实现和平崛起。

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